

汉译经典

055

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 自由与传统

〔英国〕埃德蒙·柏克 著  
蒋 庆 王瑞昌 王天成 译



译林出版社

D0-53  
2013/

P1

汉译经典

055

〔英国〕埃德蒙·柏克 著  
蒋 庆 王瑞昌 王天成 译

# 自由与传统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传统 / (英) 柏克 (Burke, E.) 著;  
蒋庆, 王瑞昌, 王天成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ISBN 978-7-5447-3114-0

I. ①自… II. ①柏… ②蒋… ③王… ④王… III.  
①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5301号

书 名 自由与传统

作 者 [英国] 埃德蒙·柏克

译 者 蒋 庆 王瑞昌 王天成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胡慧华 段四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4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114-0

定 价 2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汉译经典

丛书策划：贺鹏飞 兴安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 王洛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尹吉男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 邓正来 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教授
-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冯川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 冯克利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西川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
-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 许渊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孙周兴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吴正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应 奇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 汪剑钊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陈中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 季广茂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葛红兵 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教授
-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臧仲伦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 戴嘉枋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

## 英文版导言

与其他学问相比，政治学对人文学者一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政治对人类生活和道德秩序来说是根本的，这类论题也是文人们最喜欢议论的。与历史一样，政治思想这一人文学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科学。柯勒律治和雪莱都是热衷于政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对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的“政治家”。假如我们不失时机地汲取了他们的指点的话，我们至少有可能免遭由于失策而导致的许多剧烈苦痛。但是，把这些人文学者归为艺术家更恰当些，把柏克与他们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因为他们的拿手好戏仅在于论说政治的方式和风格，而柏克属于柏拉图、卢梭这一类型的人。与他们一样，他还了解许多其他事情，而且了解得非常出色。与道德一样，政治这门学科不只是关起门去学就能学好的，它应是成熟和智慧的结果。谈及柏克，塞缪尔·约翰逊<sup>①</sup>曾说：“任你挑选一个话题，他都能给你谈得头头是道。”

年轻时，柏克就开始了文字生涯。1756年，他的《为自然社会辩护》和《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两本书出

---

<sup>①</sup>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评论家、诗人、散文家，第一部英文词典的编纂者，文学俱乐部 (The Literary Club, 成立于 1764 年) 的主席。柏克是该俱乐部的成员。——译注

版时，他二十七岁。他最后一部著作《论弑君和平信札》出版于1796年，那时他六十七岁，距离辞世仅有一年之久。在这四十年当中，他写的、说的绝大部分是政治，但也忙里偷闲，写了《戏剧论指津》和《英国史要略》。他的某些观点曾改变过，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具摧毁力的政治事件——法国革命——发生后，尤其如此。他不曾把他的观点系统地表述在一个专论里，以便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厘定他的各个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人们在他的著述之中寻觅他的哲学时，其基本构架自始至终具有明显的一贯性和恒定性。

今天，柏克被称做保守主义者，以大多数人的衡量标准而言，他的确是，但是，他献身政治却是为了改革。他是美洲事业的两大欧洲宣传家之一（另一位是托马斯·潘恩）。为宗教宽容辩护时，他舌若电光，应者莫当。他痛斥非洲的黑奴贸易，不遗余力地与英国当局在印度殖民地的腐败行径和蹩脚管理进行战斗。他提出“自然的贵族”来对抗“世袭贵族”，从而对贵族阶层予以打击（如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曾做过的那样）。“你们还以为，”柏克写道，“我试图把权力、权威和荣誉限定于由血统、名分和称号所圈起的小天地之中，你们错了！阁下。除了美德和智慧，不论是实际的或推定的，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当政的资格。”他谴责国王和“国王的朋友们”插手政治，设法使他的经济改革法案得以通过——此法案顶住了乔治三世的执意反对，至今还被称做“很可能是18世纪英格兰所通过的最重要的单独的改革法案”。

柏克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在政治上，“湖畔诗人”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信徒。他的浪漫主义对经常显得纤弱、做作的启蒙时期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矫治。他的感悟力和经验使他能意识到那些若欲拥有和实现正义就免不了会出现的复杂局面以及决断和操作中的苦衷。对那帮搭起架子准备统治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外

行和空谈家，他怎么能不起疑心呢？

柏克对我们有何等价值，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他。如果我们把他当做我们的政府或针对政府某些倾向的批评者，那么，必须把他当做来自内部的批评者。那些批评民主的人可以是政府最得力的朋友，但是，只有当他们的基本信仰一致的时候，才是如此。因为这样，他们才是依据理想来批评现实，至于理想本身，他们并不反对。想要抑制自由权，却不想使其成为更负责任的自由；企图奴役人而不是去解放人——这些人才是政府真正的敌对势力。

柏克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对我们理解俄国革命具有如此之大的参考价值，以致这成了我们开发柏克价值的一个最佳范例。他的思想此时都汇聚在一起，得到重新思考和完善丰富，然后继续前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在殊死搏斗之中，他的度量有时不够宽大；他有时有些浮夸；有些事情他也看得不够清楚。他认为法国革命是财产权的敌人，因为它褫夺了贵族阶层的财产，而且事实上法国革命又把财产送到了那些最心狠手辣地攫取钱财的人的手中。他忽视了革命对那些最富热情、最单纯的年轻人的感召力。在人民的正当权力的问题上，他对自己早期的信条有所修正。令人费解的是，他竟淡化旧制度的劣迹，如今天某些人淡化沙皇政权的丑行那样。<sup>①</sup>但是，他在战斗，在与一个他认为对人类文明有致命伤害的观念战斗。令人惊异的是，他看到的是如此之多、推断得如此之准。不要忘记，他甚至预见到了波拿巴主义：

---

① 柏克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关于玛丽以及认为应给予她骑士般的优容的那段文字是如此过分，致使潘恩有力地将了他一军，说：“他怜惜鸟儿漂亮的毛，却不顾它奄奄一息的命。”——英文版编者注

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王后。——译注

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那个实际握着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看来柏克很善于预测，他能准确预知革命的洪流正流向何处。据说，这种传闻是真的：与柏克决裂之前，潘恩曾认为，他能说服柏克，让他站到法国革命事业这一边来，并让他了解革命领导人的秘密决定。有一点是清楚的，潘恩的确曾把杰斐逊的一封信送给柏克看，而当时杰斐逊是美国驻路易十六王朝的大使，对革命领导人的某些计划有所耳闻。但是，不论潘恩得到的特别消息有多少，抓住革命本质的人却是柏克，并且是早早就抓住了，这一点是没有其他哪个人曾做到的。他的敏锐伤害了他的声誉，他是一个早熟的“法国革命反对者”，正如其他一些人曾是“早熟的反共者”或“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那样。

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基本没有超出柏克的预测。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三个阶层的代表坐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第三阶层的代表单独开会，从而迈出了走向革命的关键一步。同年10月，在柏克的笔下，正在发生的事态已引起了他的警觉。<sup>①</sup>到1790年11月时，柏克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已经成型，

---

① 起初，法国大革命并不由雅各宾派主导，一如俄国革命之初非由布尔什维克主导一样。在这两场革命中，面对暴政的倒台，许多世人都曾为之欢呼过。但是，对于真正的危险，即革命暴政，人们认识不清，毫无防备。也许法国的米拉博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是明察的。——英文版编者注

孔德·米拉博（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演说家。在革命中持温和立场，主张君主立宪。1791年当选国民议会主席，不久辞世。——译注

于是就发表了《法国革命反思录》。1794年2月5日，那时恐怖统治已持续达11个月之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说：

他们说恐怖主义是专制政府所用的手段。那样一来，我们的政府不就和专制主义一样了吗？是这样的，正如在为自由奋斗的勇士手中闪烁着的刺刀与用以武装专制政府的走卒的刺刀并无不同样……革命政府就是要以自由的暴政来对抗专制。<sup>①</sup>

柏克辞世两年后的1799年，波拿巴就任第一执政官。

柏克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所看到的，与纳粹带给20世纪的东西，性质颇不相同。奥雷尔·科尔奈称之为“对西方的战争”，一如来自西方传统之外的攻击（即便从技术上看不是如此，至少从理论上正是如此），这些攻击的发源地，一部分在古埃及，一部分在热带丛林。而法国革命，按照柏克的理解，虽然也是对西方的一种攻击，但他的思想基础却是自己文明当中最优秀的东西。只是柏克让这些优秀的东西从历史背景中挣脱出来，并被柏克转化为纯粹的哲学，既傲慢又缺乏根基罢了。俄国革命是可以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的，它受着意识形态（ideology）的蒙蔽，像法国革命假借“理性”那样去假借“科学”。俄国宣布革命是致力于古往今来的人类理想，这也是步法国人的后尘。恰如拿破仑的军队仍然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一样，斯大林的军队也象征性地举着“无阶级的社会”的招牌，革命的标签糊在反革命的坛罐上。

因为柏克是位保守主义者，有时他被误认为是一切革命的敌

---

<sup>①</sup> 在苏维埃论战当中，我们能听到多少诸如此类的辩论的回响啊！——英文版编者注

人，那是不正确的。如果根本无法改良，革命成了不得已的最后一招，那么他并不是革命的敌人。当然，即便如此，他也了解一下将要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是什么样的。“如果暴政发展到了极点，”他写道：“政府的暴戾令人忍无可忍，那么，人们就诉诸自然权利，将其推翻。”但是，只有在革命符合道德法——而不是背离道德法——的情况下，才有理由诉诸革命。职是之故，虽然柏克曾为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和美洲革命辩护，但是又将它们与法国革命严格地区分开来。前两场革命是建立在它们的传统和理想之上的，第三场革命则试图焚毁一切，以便在灰烬之上从事新的构筑。

法国革命，就其理念而论，乃是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信念促成的结果。这些信念包括：人本身具有天赋权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自身禀赋的理性足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没有哪个人希望邪恶，所以，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们就会依之而行。理性之君被推上王位；历史被认为是偶然性和非理性的王国；通过思想人们可找到真理，通过真理指导行动，人们可以消除数世纪以来的贪婪和祸患造成的后果；而且利用正义的法律，人们可以从头开始，另起炉灶。（这里的某些论点与共产主义不一样，但其品性并无二致。）

柏克的攻击，并非像被经常喧嚷的那样，是以历史来对抗理性。也许，他首先应当是理性的守护者。他所痛恨的是理性主义，是从先验的或设定的前提推导出整个观念体系的做法。柏克并不反对归纳综合，他是一个要求社会原则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包括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之上的经验主义者。他甚至认为，总是盯着抽象的方法乃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懒汉”用以躲避辛勤地获取经验的计谋，而对现实缺乏耐心就会导致流血。

在柏克看来，抽象化是疯狂行径的温床。如果某人老是用逻辑范畴进行思考，那么，他最终会遗忘他的人民。柏克说，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mankind）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men）却很不耐烦，更为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忘掉。疯狂者之所以要诉诸枪弹和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根据某个原则认为某一阶级的成员应当灭绝。抽象化的做法是把具体的人加以分类，然后就抛弃他们仍是人类的想法。“让我们把贵族消灭掉！”（或“清算资产阶级！”）这样说着，就开了杀戒。“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会比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还要冷硬，与其说它近似于人性的脆弱和激情，还不如说它近似于恶鬼的冷酷更妥帖。”把“形而上学家”读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家”，这样，柏克的意思就明朗了。这些人会把整个群体都消灭干净（杀掉一切贵族，或者杀掉一切资产阶级，或者，就此而论，杀掉一切律师，这与种族灭绝相比，有何逊色呢？），或者牺牲当代人，以成就未来的人。后一理论意味着我们这些人不像未来的执政者那样重要。（换句话说，林中一只鸟，胜过手里两只鸟。<sup>①</sup>）这如同不抵抗主义者之所为：他拒绝战斗，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但出于崇高理想，为了拯救某些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揆其意思，大概以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唯有他自己的生命例外。

狂热地牺牲目前以成全将来，对此，还有一个奇特的柏克式的反驳：今天是明天的过去。明天会是什么样，主要取决于今天是什么样。民族传统，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令人难堪的传统。今天的所作所为，若欲将其后果清除干净，那是很难的。理性主义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让人带着被认为是先验的既定原则去面

---

① “手里一只鸟，胜过林中两只鸟”乃一英国谚语，此处作者系逆义套用。——译注

对经验，而这些原则根本不是以往经验的结果。尽管柏克全心全意信奉自然法，但柏克明白，它的原则只能是一般性的指南，后果和前提都与道德抉择紧紧地关联着。“在一切道德抉择系统中，”柏克说，“合乎道德的结果就是它的检验尺度。”对行为的后果予以足够的关注，这在私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生活中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既能防范疯狂激情的可怖肆虐，也能克服刻板可笑的教条。

柏克对历史的关注恰恰是以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基础的。他想让理论以实践为基础，让实践以理论为指导。但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其自身必须是已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检验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背景是，也只能是，历史。我们的制度是某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是一些继续实施着的制度。如果它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故障，那需要对其加以改革。唯有当它们在某些新情况下完全瘫痪，或产生邪恶的时候，才可以将其换掉。因为彻底的革新是一种投机生意，是性命攸关的事。在筹划、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在革新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如何选择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寻求指导。因为，那正是汲取人类经验教训的正确途径。法国的理性主义压根儿不这样做，因为它否认历史之中寓有理性，仅在头脑中寻求理性。柏克对历史的维护很容易遭到误解。理性主义者们维护理性，摒弃历史。与此不同，柏克维护历史，却并不摒弃理性。他是为理性而利用历史，而非为历史而历史。他说：“上帝禁止我们企图通过因循守旧来获得智慧。”

理性主义者强调抽象理性，不难想象，柏克在这里发现了现代世界急剧蔓延的人格分裂现象的起因。如果理性与情感和本能是联结着的，是被感性推动着的，是由历史文明滋养着的，那么他就信任它。他不信任没有情感和道德的理性，一如他对脱离经

验的理性存有戒心。说实在的，要是他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宁要单纯的习俗和“偏见”，而不要单纯的抽象理性。因为礼俗乃“国家的恒久的智慧”，抽象理性不大可能比它强。真正的理性是与情感和经验联合在一起的，它尊重现存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是谦恭的，因为，它试图尽一切可能更多地理解道德秩序（对柏克来说，道德秩序就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同时也能意识到它所了解到的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理性之所以是谦恭的，还因为它认识到，要是対实情视而不见，最大的抽象之善会立即变成邪恶。

抽象理性、理性主义，几乎类似于漫无边际的想象。它不像情感那样，植根于具体的事物，并受着我们对其产生的反应的节制。由于傲慢，理性拒斥世人的情感，认为那是幼稚的，不足挂齿的，总是不顾风险把不寻常的或陌生的情感加以理性化。人不单是理性动物，理性若不与情感联袂，不被道德收束，就有可能沦为强猛狂戾的激情的俘虏。支配我们行为的总是不可抑制的权力欲，对荣耀的垂涎，以及隐伏的自私意念，与此同时，我们却利用抽象的权利和抽象的善对其加以神圣的解释。

实际上，如法国人所宣布的那样的抽象人权，在柏克听来是可疑的。他们宣称的自由就是，仅仅是，“摆脱某些制约——美德施加给激情的那些制约”。作为回应，柏克提出了“社会自由”——自由由于对社会中每个人的平等制约得以保障，制约既来自社会，也来自个人的自律。至此，我们触及到了柏克的人学的核心。人这种被造物，之所以从其原始状态，即自然状态，步入社会和国家，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比较便利，相反，因为人的本性只能在世俗社会中才可能得以完善。脱离社会，人就无法作为一个充分成熟的存在物存在下去。

市民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比起粗野而散漫无纪的生活方式来，它更是如此。因为人在本性上是通情达理的，不过他绝不会完全地处在自然的状态中，只有当他被置入那种理性在其中可以得到最佳培育并占据最大优势的环境中时，他才可能是如此。文化是人类的本性。至少，无论在成型的壮年期还是在稚弱可怜的婴儿期，人们同样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

通常，柏克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尽管不无托马斯主义的成分掺和其间。他的言论散发着托马斯这一格言的气息：“上帝不消灭天性，而是完善它”。

俄国革命不曾诉诸抽象理性，这是与法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它的指南针是“历史”——被贴着“科学”标签并带着明显的先验印记的原则解释过的历史。然而，在本质上，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理性与经验分离，成为道德的敌人。国家并不仅仅是作为国家出现，而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出现，它的存在为的是在各个国家煽起内战。如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俄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与西方文明的精神——道德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相抗衡。为达到目的，它不择手段——凡是对“无产者”来说是好的，就是好的，为了巧妙地营造这些手段，可以肆无忌惮。如果认为俄国只不过是另一个正在得寸进尺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并进而试图用 19 世纪的伎俩挫败它，那将是自杀性的愚蠢之举，不过，在政治这一领域，我们还是小学生。

柏克发觉，对雅各宾派，英格兰同样没有应对的准备。

那是个可怕的事实，又是个不能掩盖的事实。在能力上、在技巧上、在对他们观点的认识的清醒程度上，雅各宾主义者们都高出我们一筹，他们一下子就能瞄准事物。对于这场战争，不论

法兰西政客们最初所抱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能把握住它的精神：就其目标而言，它是一场“内战”（civil war）。<sup>①</sup>于是，就以打“内战”的方式来进行。它是一场欧洲古代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热烈拥护者对抗一帮打算将其全部换掉的狂热而野心勃勃的无神论者的战争。这帮人的目的不是欲将法兰西帝国的海外领地扩展至其他国家，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以征服法国为起点。

听起来柏克好像在谈论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在谈论雅各宾主义者。听起来总是那样，因为他谈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宗教呢？共产主义排斥它，那些信仰国家的人不能容忍有别的信仰与之竞争。雅各宾主义也是排斥宗教的，尽管有一些表示赞成的言词。柏克指出了其中的一个原由：“你们的独裁者们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头脑中斩草除根。”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它不同于一般的专制主义，因为，它插足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每个问题都有政治性的一面，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政治角色。这样并非单纯为了提高效率，实际上，这样反而经常是浪费的、低效率的。原因是：他们的政治是建立在一种包揽一切的信仰体系之上的，比任何其他关切都有更大的优先性——如果其他关切尚有存在余地的话。人们通常认为，极权主义是 20 世纪的产物。然而，柏克当时就发现，雅各宾主义的政府管得太多，它的手伸向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甚至干预了家庭。“从革命那天开始，”柏克说道，“法兰西就成了一切政权当

---

<sup>①</sup> civil war 一词在此系双关用法，除“内战”之义外，尚兼有“文明之战”、“文化之战”之义。——译注

中最彻底、最专断、最有效的政权。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绝无仅有。”简言之，柏克发现它是极权性的。

在他们的政府方案中，个体性旁落在外。国家是一切的一切。……为达到它专有的目标，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

至于那些豪言壮语的具体落实，他们作出过哪怕是尝试性的努力吗？举个相反的例子就可明了一切：1936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享有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免费教育”。可是，到1940年，中等学校学生和大学生所享受的助学金被取消了，并在中等学校的高年级和所有高等院校中实施了非常昂贵的收费制度。那些因父母付不起学费的年轻人，被大批地征募起来，充作干粗活的劳力。尽管雅各宾派执政下的法兰西号称以人权为本，但还是重新启用了投票制的财产资格制。柏克评说道：“此前，你们对他说，在他出生时，自然就已将财产权利无偿地给他了，而且，地球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威可以将其剥夺。可现在你们又命令他去购买这项权利。”

最后看来，对此类革命的指控，既可以出自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完全可以出自一个自由主义者。要紧的是，必须信奉西方文明，信奉正义，信奉我们称之为“民主”而柏克也许会称之为“代议制”的那个东西。简言之，这种指控是这样的：把我们从文明中辛勤得来的成果与它的成长条件和它正当的适用环境脱离，并把它宣布为通向我们远古的传统目标的唯一大道。他们问道：我们能有别的办法来实现人类的和平、平等、富裕和友爱吗？这些目标虽未实现，但总有实现的方法（“抽象理性”、“科学”）。他们说：如果把新天地之前的一切都消灭掉，我们甚至有可能造出新的人类